



辩证唯物主义
新探

李秀林 主编



辩证唯物主义新探

李秀林 主编

薛克诚 洪松涛 吴定求 副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632/34 23

辩证唯物主义新探

李秀林 主编

薛克诚 洪松涛 吴定求 副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15.125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76 000 册数: 1-6 000

*

ISBN7-300-00373-7

B·46 定价: 4.40元

序

肖 前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作者大都是中国人民大学1956届哲学研究班的学员。当初是年轻的研究生，如今已都是从教多年的骨干教师了。

社会上迫切需要可供高校哲学理论教师 and 研究人员参阅的深入阐发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著作。然而，这方面的成果寥若晨星，难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形势，难以回答现代社会生活和科学发展提出的新问题。这有待于哲学理论工作者作出持续的艰苦的努力。本书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本书大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部分着重探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一部分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一部分则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应用方面作一些新的探索。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不满足于某些现成的结论，力图阐明新的见解，作出新的探索。因而题名为《辩证唯物主义新探》。

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书收进阐发不同观点的论文。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坚持和发展是辩证的关系。坚持不是“老生常谈”，没有发展的“坚持”是没有生命力的，因而也是无法坚持的。要发展，就不能不有所追求，有所探索。在探索的道路上，应当允许人们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发表不同的意见。追求真理的道路并不是笔直的，如果有失误，也将成为真理前进道路上的铺路石而发挥自

己的作用。执著的追求，不能没有理论探索的勇气。如马克思说的，“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①。

这本书的写作，自发出倡议之日起，就得到李秀林同志的热情支持，并同意由自己任主编。但遗憾的是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未能实现亲自统编本书的愿望。本书的出版也寄托着撰稿人对他们的老师——李秀林教授的怀念。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愿意写几句话，推荐给读者。

1987年5月2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5页。

目 录

序	肖 前(1)
对哲学对象的历史考察	张学惠(1)
对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范畴的理解	李林昆(23)
唯心主义与宗教同异辨	潘登榆(39)
智能模拟的哲学思考	丁珍珠(61)
论哲学应用	杨彦钧(82)
试论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	王永乾(93)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发展及其哲学问题	丁珍珠(112)
论矛盾同一性原理的实际运用	洪松涛(137)
关于否定的否定规律的几个问题	刘景泉(162)
唯物辩证法几对基本范畴的逻辑体系	吴定求(183)
论原因、结果和必然性、偶然性的相互关系	吴定求(207)
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	夏 犛(234)
论系统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普遍存在形式	李玉春(253)
事物的结构和功能	夏 犛(266)
发生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刘慧群(283)
建构论与反映论	刘慧群(309)
论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含义、关系及其意义	洪松涛(325)

天才与实践·····	潘登榆 (345)》
关于价值真理的几个问题·····	薛克诚 (370)》
价值和价值认识·····	李林昆 (387)》
真理发展刍议	
——科学发展中对立学说演变的启示·····	张国棋 (412)》
关于辩证逻辑若干问题的探索·····	刘景象 (428)》
《资本论》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开放性质·····	冯景源 (454)》
后记·····	(476)》

对哲学对象的历史考察

张 学 惠

哲学发源于希腊文菲罗索菲，意译为爱智慧。哲学自产生至今，在西欧各国已有两千七八百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但是，关于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热烈讨论，实质上与对哲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密切相关。以我管见：脱离开哲学漫长多变的历史行程，孤立地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某些不同论述，各执其一作为立论的根据，是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作出科学规定的。从这种基本看法出发，本文试图对西方哲学史上关于哲学对象的发展演变情况，作简要的历史考察，既搞清楚从古到今主要哲学流派在哲学对象上的特殊性，又在异中求同，发现其在哲学对象上的共性；既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对象上与以往哲学之本质区别，又看到两者的历史联系、批判继承关系；这对于正确解决哲学对象、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一

公元前7至6世纪，随着欧洲最早的奴隶制——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形成，哲学就诞生了。

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处于启蒙时期，知识的总量较少，哲学与具体科学尚未分化开来，它们处于浑然一体之中，被人统称之为智慧。这时哲学具有“知识总汇”的性质，哲学家往往也是掌握具体科学知识（如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的学者。古希腊罗马最早的哲学就是这种广义的智慧之学。

在古代人类基于对自然界的笼统直观而形成的智慧学中，也隐含着抽象的理论思辨的萌芽，即初步思考、探究世界万物的本原及其是否发展变化的问题；后世的思想家在研究古代哲学思想发展史时，往往把这方面的内容单独抽取出来，作为古代朴素的原始的哲学思想。这可说是后世学者基于对哲学狭义理解而选定的哲学史料。现在我们着重从狭义哲学的角度，考察一下古希腊对哲学对象的理解。

一定的时代条件制约着人们的理论思维水平。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较低，因而有不少哲学家把某一种或某几种感性物质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例如米利都学派的泰勒士，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是无规定者（无固定形态和性质的原始物质）；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是气。爱非斯学派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火。恩培多克勒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四根”——水、火、气、土四种元素。以后随着人们抽象思维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逐渐把一种较抽象的东西，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如阿那克萨哥拉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种子”；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原子。上述哲学家对哲学对象的观点，虽然都具有朴素的、感性直观的性质，但把他们的哲学观点前后联系起来进行比较，还是清楚地表现出人类对世界本原认识的逐步深化。

如果说上述哲学家是从质上试图对世界的本原作出各自的回答，那末，毕达哥拉斯派则由质进到量，提出数量是万物的本原、

范型，数产生万物，构成世界，这是对事物量的规定性的抽象。这与米利都派相比，显然表现出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数在世界万物中是有客观基础的，不能把这派的哲学观点视作纯粹的唯心主义。但它把量的规定性与质的规定性割裂，把数看作是先于自然事物而存在的实体，认为数决定、派生万物，这自然是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

比毕达哥拉斯派稍晚的爱利亚派的巴门尼德，在《论自然》中提出了“存在论”哲学，认为哲学是研究存在的学问，他说的“存在”，既不同于水、气、火等具体物质形态的存在，也不同于毕达哥拉斯派的数的存在，而是指没有任何性质、状态，与任何具体事物没有联系的、不生不灭、唯一不动的纯存在。他认为这种存在是最真实的，而处于运动、变化中的具体事物则是不真实的“非存在”。他所说的“存在”，实质上是把事物的统一、完整、静止的一面进行抽象概括而形成的一般概念。他把“存在”从具体感性事物中抽象出来，这是人类认识的进步；但他把这样抽象的概念完全与具体事物割裂，并把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前半叶的柏拉图，继承并发展了他以前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创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理念论。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理念，宇宙万事万物均由理念派生；美的事物是美这一理念的体现，善的行为是善这一理念的体现。一般人只注意具体美的事物和善的行为，而哲学家则重视研究美和善的理念本身，只有理念才是事物的本质。

伴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知识的积累，到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他初步把知识分作三类：理论的知识（包括第一哲学及神学、数学、物理学）、实际的知识（包括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应用的知识（包括应用学、美学、修辞学）。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理论的知识”，相当于广义的哲学，他把数学、物理学也看作哲学的分支；而他说的“第一哲学及神学”就相当于狭义的哲学。亚氏把“理论的知识”看作最高智慧，以与“实际的知识”和“应用的知识”相区别。他对“理论的知识”所包含的“第一哲学”与各门特殊科学从研究对象上作了初步区分，他说：“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有’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这门学问与所谓特殊科学不同，因为那些科学没有一个是一般地讨论‘有’本身的。它们各自割取‘有’的一部分，研究这个部分的属性；例如数理科学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现在既然是在寻求本原和最初的原因，那就很明显，一定有个东西凭本性具有那些原因。”^①这就是说，“第一哲学”研究“有”本身，即把“有”（存在）作为整体来研究，它只寻求世界的“本原和最初的原因”，而各门特殊科学则研究“有”的某一部分的属性。“第一哲学”即被后世称为“形而上学”的部分，这一部分的知识既不同于通过感官而直接获得的知识，又不同于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它是寻求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原理和原因”的真知。

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分类的见解，既表明当时哲学与各门特殊科学还未形成明朗的分化，又表现出哲学与各门特殊科学划分的萌芽形式，预示了以后分化的必然趋势。

在古希腊奴隶制晚期（一般指公元前334年至前146年）出现的斯多葛派，对哲学的研究对象与亚里士多德又有不同的理解。据古代文献记载，斯多葛派认为：“哲学也有三个部分，就是：物理学、伦理学与逻辑学。当我们考察宇宙同它们所包含的东西时，便是物理学；从事考虑人的生活时，便是伦理学；当考虑到理性时，便是逻辑学，或者也叫辩证法。”^②这里说的“物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2页。

② 《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71页。

理学”即“自然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伦理学”是关于社会人生的知识；“逻辑学”或“辩证法”是理性思维的知识。哲学把上述三者囊括在内，显然还是具有“知识总汇”的性质。

古代哲学所具有的“知识总汇”的性质，不是表明当时哲学家知识的丰富，而是表明当时由于整个人类的认识水平较低，只能基于对世界笼统的直观而获得浑然一体的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知识。

二

在西方的中世纪，宗教神学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哲学和其他科学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宗教神学，这时哲学名符其实地成为神学的婢女。经院哲学以论证上帝存在和所谓体现上帝意志的《圣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例如，“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安瑟伦(1033—1129)，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人脑中最完善的观念必然包含存在的真实性（大前提），人们关于上帝的观念是最完善的观念（小前提），上帝必然是真实存在的（结论）。再如，经院哲学的最高权威托马斯·阿奎那为论证上帝存在而一连提出五个证明：不动的推动者的证明、最初原因的证明、自然必然性的证明、最高真实性的证明、目的因的证明。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这种繁琐论证的哲学，是“人用理智讨论上帝的真理”^①。这时的哲学居于神学的统治之下，失去了作为尘世的智慧学的独立地位，也就失掉了独立客观的研究对象。经院哲学家的目光由现实世界转向虚幻的王国和来世，费尽心机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万能，论证神圣的事物是一切尘世存在物的原因。这种哲学实际上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59页。

是一种用理性形式装扮的神学。在漫长的中世纪，由于哲学深受宗教神学的禁锢，它留给后世的积极成果与其他时代相比显然不够丰硕。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在经院哲学内部出现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论争，把共相(一般)和个别事物的关系作为突出的哲学问题提了出来，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这实质上是围绕哲学基本问题而展开的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特殊表现形式。唯名论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预示了哲学研究的对象将由研究天国的上帝向研究尘世复归。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勃兴，冲垮了中世纪宗教神学长达千年的统治，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也迎来了哲学思想觉醒的黎明。随着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产生与发展，市民资产阶级哲学家逐步使哲学摆脱神学的羁绊而取得独立地位。

三

在近代，西欧各国进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这一时期哲学领域的主要矛盾从阶级性来说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哲学同封建的意识形态——基督教神学、经院哲学的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早期资产阶级哲学家对哲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又各不相同。有继承恢复古希腊把哲学视作“世俗文化”的智慧学的观点，例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在他的《哲学原理》序言中说，“哲学一词表示关于智慧的研究，至于智慧，则不仅指处理事情的机智，也兼指一个人在立行、卫生和艺术的发现方面所应有的完备知识而言”。并对哲学研究的内容，作了如下形象的论述：“全部哲学就如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别的一切科学就是干上生出来的枝。这些枝条可以分为主要的三种，就是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显然，笛卡尔既把“形而上学”看作狭义的哲学，也把广义的哲学看作“知识总汇”。

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弗·培根(1561—1626)认为,“关于形式的研究就构成形而上学”^①。他所说的“形式”是指“支配和构成简单性质的那些绝对现实的规律和规定性”^②。即培根认为事物内部规律性或事物的性质乃是哲学的研究对象。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奠基人霍布斯(1588—1675)认为:“哲学的任务乃是从物体的产生求知物体的特性,或者从物体的特性求知物体的产生。”^③他把物体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哲学是“探求物体运动的原因的知识”。他把物体又分为两类,一为自然的物体,由自然哲学进行研究;一为“人造物体”——国家,由公民哲学进行研究。

上述哲学家关于哲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在异中有同,都把客观世界的事物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即研究世界是什么,着重研究本体论问题。而英国的休谟(1711—1776)却使哲学研究对象与先前相比起了明显变化,即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他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性”,其中包括人的知性、情感、道德。他强调人性是一切科学的核心,一旦掌握了人性之后,其他科学中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他在其主要著作《人性论》中,着重探究了知识的起源和性质问题,对认识自身活动进行反思,建立了他的怀疑论(即不可知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1724—1804)在批判莱布尼茨的唯理论和休谟怀疑论的基础上,把批判地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在康德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费希特(1762—1814),主张哲学应以人的内心、自我为研究对象,并建立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黑格尔(1770—1831)以“绝对

①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2页。

② 同上书,第56页。

③ 同上书,第64页。

精神”（绝对理念）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他指出特殊科学以“有限的对象和现象”为研究对象，哲学则以“完全普遍的对象”为研究对象。他说：“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①他说的“完全普遍的对象”、“绝对”是什么？是被他看作世界万物之本原的“绝对精神”。黑格尔把绝对精神既看作客观的思想，又看作事物的本质，绝对精神辩证发展的过程，也是绝对精神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又是逻辑范畴发展演变的过程，这样他就在唯心论的基础上，把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统一起来了。

德国古典哲学中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1804—1872），把哲学研究的视角，由抽象思辨的精神领域转向现实世界，创立了人本学唯物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他说，“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②。他认为只有在人身上，才能找到思维和存在统一的现实基础。

以上是近代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对哲学对象的基本看法。这一时期是一个学派林立、哲学成果宏富的时期，西欧各国资产阶级在反对天主教会，批判经院哲学的斗争中，从本国的历史条件出发，利用了不同的思想遗产，分别创立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哲学。从本体论来看，有机械唯物论、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和二元论；从认识论来看，有经验论和唯理论，两派内部又各有唯心唯物之分。这些性质不同、五彩缤纷的哲学体系，对哲学研究的对象或主题，尽管见仁见智、见解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的时代特征——作为“科学的科学”而出现。

①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新1版，第184页。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各国先后产生了以科学实验为基础，对自然界各领域分别进行研究的自然科学。17世纪至19世纪初的200多年间，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例如：牛顿和莱布尼茨创立了微积分，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三规律，牛顿提出了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创立了古典力学等，这标志着数学、机械力学已取得系统的科学形态，从哲学中分化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19世纪上半期，自然科学进展更加迅猛，例如：道尔顿创立了近代原子论，赖尔创立了地质学理论，法拉第、麦克斯韦建立了电磁学理论，基尔霍夫提出了能量守恒说，施旺创立了细胞学说，达尔文创立了生物进化论等，这说明化学、地质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各门具体科学也从哲学中分化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各门具体科学从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分化出去，是符合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历史进步；它既有利于各门具体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又能为哲学的丰富、发展提供更可靠的科学知识基础。各门实证科学先后从哲学中分化出去，自然就使哲学作为“知识总汇”的状况难以继续了。这就要求哲学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正确处理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关系，重新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是哲学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但是，时代向哲学提出的新课题，在19世纪初解决的条件尚未成熟。第一，当时具体的自然科学虽已有了相当的分化，但分化得还不够充分，而且深受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束缚。第二，在社会历史领域，虽然各种含有不同程度合理内容的经济学说、政治国家学说、社会发展由低到高的分期学说等，正在不断萌发、成长，但由于受到传统唯心史观的局限，还不能建立严格科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第三，资产阶级学者固有的阶级偏见，限制了他们的哲学视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所谓“科学的科学”的哲学。在这一时期，有一些具体科学虽然在事实上已从哲

字中独立出去，任何一种哲学都再也不可能将所有具体科学统包在自己的体系之内，但是资产阶级哲学家囿于传统积习，不愿放弃哲学对具体科学的统辖权，往往试图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①，似乎只有包罗万象，才能构筑绝对真理的体系。另外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系统化、理论化的学说，它和一切具体科学虽然都要研究现实世界，但各门具体科学只分工研究世界的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某一事物及其发展过程，而科学的哲学应以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普遍本质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当在成长中的各门具体科学还不能揭示自然、社会、思维一切领域、一切方面之特殊规律时，资产阶级哲学家想对具体科学尚未占领的领域，用哲学思辨、逻辑推演来填补科学发展中的空白，用臆测来说明整个世界的本质和普遍联系、发展规律；有的哲学家认为，各门实证科学只能对事物现象作经验性的描述，要想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还必须靠他们的哲学。这种哲学虽也概括了已取得的某些科学成果，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或天才预测，但是由于它不是完全建立在概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基础上，所以随着具体科学的每一新进展、新发现，都一再暴露出其作为“科学之科学”的谬误。正确解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否定“科学之科学”的历史使命，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完成。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这一变革既体现在它的内容方面——建立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高度统一的完整科学体系，而且也体现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注。